

政事篇

跪拜之争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自居，对“礼”自然格外注重。在所有的礼仪中，最为庄严、隆重、神圣不可“冒犯”的，当属拜见皇上之礼。中国的皇帝们认为，礼仪是“权威”的象征，维护、加强礼仪就是维护、加强“权力”，所以要不顾一切地维护“成礼”，有时甚至重“名”远甚于重“实”。由于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所以华夏之外统统是“不文”的野蛮世界。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礼乐规范来“教化”。

但就在中国清王朝的乾嘉盛世，来自“化外”的英吉利（即英国）的“番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却不肯行拜见皇帝的跪拜之礼，不仅明拒“教化”，自甘堕落，且生出一段又一段难了的“是非”。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有700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廷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

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马氏一行辗转来到北京后，他没想到却因拜见皇上之礼与清廷争论不休，最终没有达到目的。

正处盛世的大清王朝，上上下下没有一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马氏一行自然受到中国官员的热情款待。不过使之极为不快的是，他们的船队却被插上了“英吉利贡使”的长幡；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礼物”二字改变为“贡物”无论该国正副使臣，都被称为“贡使”。既然是“贡使”来“进贡”，晋见皇帝时当然要按“天朝”体制向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提出只有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也只好单膝下跪吻手礼，所以坚决不同意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之礼由于中方一再坚持，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对待”原则，如要他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之礼，中国官员也应向英国女皇像行此礼，否则他只以向英皇所行之屈一膝的吻手礼向乾隆行礼。此为中方官员严拒。从 7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最终，还是中方妥协，同意英使不行双膝触地的跪拜之礼，而只屈一膝的要求。

这样，在 9 月中旬谒见皇上、“万邦来朝”同庆大清乾隆皇帝八十三大寿的庆典中，只有这几名不堪教化的“生番”拒不行双膝跪拜之礼，而行单腿屈膝礼，犹如鹤立鸡群。不过此时正值盛世，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无人料到此事其实是几十年后中国文化要遇到一个更强的文化的巨大挑战。

虽然“天朝”宽大为怀，免去这几个“生番”的跪拜之礼，但对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他认为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所谓“天朝”体制，是指凡西洋各国只

有愿意为“天朝”当差者才准其长期居京，既然在“天朝”当差，实际就是“天朝”的臣民，因此要“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乾隆皇帝确实无法理解马氏提出的在各国首都互派外交使节，不能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对通商要求，乾隆皇帝则认为毫无必要，因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氏一行在受了一番羞辱之后，一无所获，于 10 月被迫离京返回。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又有阿美士德率团来华，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责”，诚心向化。不想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清朝官员反复要他演练晋见皇上之礼，均被婉拒。嘉庆皇帝得知详情自然大怒：“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便传旨遣其回国。

最后，“世界最强”的国家终于按捺不住，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礼仪之邦”一点一点地放弃自己的“成礼”，在血火中被强行纳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

案例思考题：

- 1 跪拜之争这则案例反映了清王朝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 2 造成清王朝闭关自守的文化理论是什么？
- 3 这种跪拜“礼仪”之争背后潜藏着中英之间两种不同文明观的碰撞。这两种不同文明观的内涵各是什么？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持的文明观使中国丧失了什么样的机遇？

（采编：孙祯祥）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

先秦以来，“夷夏之辨”的观念作为中国人处理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势，牢牢地凝固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直到明清时期，这种具有强烈的族类主体意识、族类排他意识和族类优越意识的观念仍支配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清中叶以来，封建统治者又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和闭关自守的文化封闭政策，更加堵塞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一种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心态弥漫于封建统治者之中。他们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命为“天朝上国”，不肯睁眼看看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深闭固拒，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是最先进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世界的形势和日益临近的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性。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是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

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流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舰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远达非洲海岸。18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衰弊陵夷之际”，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虚弱性。清政府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当然也不会有对付资本主义侵略的正确策略。只是神经质地认为，这一外来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骚动。由于这种原因，清政府构筑了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做了种种苛刻的限制和防范。

清初，由于东南沿海还有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抗清武装在活动，清政府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远洋贸易，几乎停顿。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代中叶，由巨大的帆船组成的中国商船队还经常出没于远洋洋面。此后，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载重量越来越大，航海技术日益进步。而清政府反而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在外活动和经商，清政府也多方加以阻挠，并对他们十分歧视。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但清政府横加限制，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出口之列。为了杜绝粮食和

铁器出口，竟规定每艘商船只准携带铁锅一口作为炊具；只准携带铁斧一柄，作为用具；预先规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带口粮一升，余粮一升。海上情况变幻莫测，航行很难定期，清政府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剥夺了商船武装自己对付海盗的手段，而且在漫长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丝绸是当时对外出口的大宗贸易，由于出口增加，丝价上涨，这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中国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可是清政府看到丝绸涨价，神经紧张起来，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禁止丝绸出口，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早期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具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来到中国的某些外国人，傲慢粗暴，趾高气扬，甚至犯罪作恶，无法无天。对于那些侵略分子、犯罪分子，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清政府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笼统对待，规定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这不仅妨碍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助于防范真正的犯罪分子，从而有效地抵制侵略。

从根本上说，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的强固结合。几亿农民分散地生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绳索束缚起来的农村中，无数个村庄、集镇和城市相互隔离，没有和周围广阔世界进行频繁联系的必要与可能。在落后闭塞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的思想。18世纪末，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国际贸易和交往中的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正是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

在落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17世纪和18世纪，西欧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

牢笼，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放射出奇光异彩。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词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古老的教条。中国人民与世界的历史潮流相隔绝，也就谈不上学习先进的东西，而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闭关政策破产了。但是产生这种政策的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也不可能很快消失。到了近代，中国的门户已经大开，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蜂拥而入，这时候，一些封建顽固派仍然力图回避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拒绝接受一切新鲜事物。鸦片战争后，为了保持虚假的“天朝”体统，道光 and 咸丰两代皇帝躲在紫禁城内，从来不和外国人见面。在外国的强硬要求下，经过30年之久，同治皇帝才被迫第一次接见外国公使。清政府也不愿向外国派出外交人员，同样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勉强组成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到欧美巡回访问。同治元年（1862年），北京设立同文馆，后又增设天文算学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学校。同治十年（1871年），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出国学习，这两件事被顽固派激烈攻击为“用夷变夏”，在政治上掀起轩然大波。结果，留美学生中途停学，全部撤回，同文馆也招不到学生。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建筑一条15公里长的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清政府却以28万两白银的高价购回后，拆毁扔弃在水里。光绪七年（1881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最初由于顽固派反对用蒸汽机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爬行。封建顽固派扬言：“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可见闭关自守、

夜郎自大的思想流毒甚广，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进步。

案例思考题：

1. 分析晚清“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背景。
2. “闭关”政策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采编：王丽萍)

严禁与弛禁

——清廷内部关于鸦片的争论

鸦片战争前 70 年间，中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和英国已有相当规模的海上贸易。当时英国主要向中国输出它的王牌产品——毛织品和金属制品，而从中国输入茶叶、丝绸、瓷器等土特产。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且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政策，使英国的工业品很难在中国打开市场。相反，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土特产品却在英国很受欢迎，需求量很大。因而，英国出现巨大贸易逆差。据统计，1781 年到 1790 年的 10 年间，中国向英国仅输出茶叶一项就价值 9600 万元（银圆），而 1781 年到 1793 年的 13 年中，英国输入中国的工业品总值才 1600 万元（银圆），不及中国输入英国茶叶额的 1/6。英国为获取中国的茶、丝，每年不得不支付几百万两白银来平衡英中贸易的逆差。尽管英国又努力向中国推销其棉纺织品，但销路很小。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发现鸦片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商品。它的售价比成本高得多，而且吸食成瘾，就难以断绝，就不能不经常地、愈来愈多地需要它。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只要吸毒成风，

就会成为鸦片的广大市场。因此，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以改变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美、俄等国也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输入数量连年增加，1834 年上升到 2 万多箱，1838 年猛增到 4 万箱以上。

鸦片的大量输入，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形势，使其由入超变为出超，从中获取了神话般的利润，但却给中国带来严重祸患。一是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仅在鸦片战争前 20 年里，中国白银外流达 1 亿两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国库空虚，银价上涨，银贵钱贱。1794 年，制钱 1000 文可换白银 1000 两，到 1838 年，换 1 两白银就要制钱 1600 文 ~ 1700 文，这对以铜钱按银钱比价交纳赋税的老百姓来讲，实际负担就增加了许多。二是烟毒泛滥，吏制更加腐败。据 1835 年统计，全国吸食鸦片者超过 200 万人，遍及十几个省，而且官员吸食鸦片成风。直隶官员几乎全吸鸦片，“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吸鸦片者，甚属寥寥”。这些官员为了支付日益增大的鸦片价款而加紧搜刮百姓。三是严重摧残了吸食者的健康，破坏社会生产力。据浙江巡抚刘韵珂报告：“黄岩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杲杲白日，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活画出人们在吸食鸦片后出现的精神萎靡不振、日夜颠倒而置生产于不顾的可怕景象。面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鸦片侵略，深受其害的广大人民深恶痛绝。他们把罌粟称为“妖花”，视鸦片为“毒蛇”，称鸦片走私船为“鬼船”，把烟贩比做“狼虎”，强烈要求禁烟。1838 年 12 月，英、美等国无视中国主权，竟然强行干涉广州政府对烟贩的处决，抢走烟贩，捣毁刑场。愤怒的群众 8000 多人自动赶来，包围洋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对于外来的鸦片侵略和人民群众的禁烟正义要求，清朝统

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态度，1836年到1838年间展开了激烈争论。大体说来，分为弛禁派与严禁派。太常寺卿许乃济是弛禁派的代表，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这一派的总后台。许乃济在1836年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放弃禁烟政策，允许鸦片按药材入口纳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以白银购买；民间贩卖吸食，一律勿论，只禁文武官员、兵丁等吸食；同时允许内地种烟。他认为禁官不禁民，禁白银外流不禁鸦片贩运、种植，可以解决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这种主张就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以符合吸烟集团的利益，但其结果必然使鸦片流毒更深更广，导致祸国殃民。当时，在上层官僚层里，弛禁派的实力很大，直隶总督琦善、吉林将军祥康、云贵总督伊里布等人都属于这一派。

在鸦片走私危机及清朝封建统治的刺激下，统治阶级中分化出少数有见识的开明官僚。他们一致主张采取果断措施，严厉禁止鸦片的吸食和输入。鸿胪寺卿黄爵滋、湖广总督林则徐等，是这一派的著名代表。1838年6月，黄爵滋鉴于形势严重恶化，上了一个奏折，认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的办法是：广传戒烟药方，限期1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等治罪。道光皇帝一方面觉得可以从粤海关得到大量“贡献”，另一方面又感到鸦片泛滥、白银外流威胁着他的统治，所以犹豫不决。于是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复议。复议中，湖广总督林则徐坚定地支持黄爵滋的禁烟主张，并于1838年7月提出《严禁鸦片章程》六条，并在两湖地区切实执行。1838年9月，他又上疏进一步说明了“重治吸食为先”的道理。他说卖梳子的不会跑到和尚庙里去，果真禁绝吸食，谁会开馆运贩？他说“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法当从严”吸食立断。否则

“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由于林则徐等人的禁烟主张是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出发的，所以道光皇帝不能不为他们的主张所打动。瞻念前途，道光皇帝倾向于支持严禁派，并下令罢了许乃济的官，以示惩罚。同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案例思考题：

1. 对为害中国的鸦片泛滥，清朝统治者的严禁决心为什么没有一以贯之？
2. 对于当代扫毒斗争，严禁派的主张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采编 裴永斌）

台湾的统一与撤府建省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这段史实，是指 1662 年 2 月，郑成功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从而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对我国台湾长达 38 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为保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年的 6 月，郑成功病逝，台湾的军政要务则由其子郑经主持。

康熙二十年（1681 年），清政府平定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的“三藩之乱”后，国内形势较之清初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相对缓和，统一与分裂的矛盾急需解决。但这时的郑经集团仍以南明王朝为正统，割据台湾，已失去了原来抗清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成为国家走向统一的障碍。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日益加剧，郑经和他的叔父郑袭发生火拼，各派之间争夺权力，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许多将领和士兵感到没有出路，渡海归降了清朝。“三藩叛乱”时，郑经出兵攻占厦门，并攻泉州，与耿精忠一时勾

结，一时成仇，军事行动失去了政治方向，不可能再提出有号召力的政治主张。

平定“三藩之乱”的这一年，郑经死，由其长子“监国”，因诸弟争位，又发生内讧。郑经手下一个姓冯的部将杀了郑经的长子，立年幼的郑克塽为头领。这时，台湾郑氏集团政治腐败，内部分崩离析，“人心惶惑未定”。郑克塽等为了苟延残喘，保存割据地盘，曾向清政府“遣使赍书，愿称臣入贡，不剃发登岸”，想要成为一个半依附半独立的国家。清政府正确地坚持了国家统一的立场，拒绝了郑克塽的荒谬主张。

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早在康熙皇帝亲政以前，以鳌拜为首的保守势力，压制攻取台湾的正确主张，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驱驰制胜，计难分全”为借口，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了起来。后来，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节节胜利，康熙皇帝再次提出统一台湾问题，主张“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底定海疆”。于是在福建沿海调兵造船，布置进取，并重用主张统一台湾的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筹划向台湾进兵。这一统一台湾的正确主张和部署又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说什么“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主张“征台湾宜缓”；且极力反对任用施琅，“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皇帝排除了这些大臣的干扰，坚持统一台湾的主张，把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的原水师提督调为陆军提督，把反对收复台湾、以台湾“断不能取”的福建将军喇哈达调回北京，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攻取澎湖、台湾”。

根据当时台湾的兵力，施琅主张收复台湾，必先取澎湖，“以扼其喉，则形势可见，声息可能”，台湾兵力可不攻自溃。清军经过一段时间海上作战训练之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施琅率战船 300 艘,水师 2 万人,自福州出海攻取澎湖。郑氏集团集中兵力于澎湖,派善战的刘国轩率军坚守,“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施琅等准备充分,指挥得宜,士气旺盛,一鼓作气向前冲击,经过 7 天激烈的战斗,郑军大败,守将刘国轩乘小舟逃回台湾。

台湾以澎湖为门户,清军攻占澎湖,使郑氏集团极为惊恐,“群情汹汹”,台湾呈现出“莫不解本”的局面。最后,郑克塽率众出降,清军胜利进驻台湾。

清政府在攻占台湾以后,在对台湾的处理问题上又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荒谬地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竟然主张放弃台湾。施琅等人极力主张坚守台湾,认为台湾经过长期开发,不仅会成为“野沃土腴,物产利溥”的富庶地区,而且为“东南数省之屏蔽”,在国防上极为重要,如果放弃,必将被“无时不在贪涎”的西方殖民者重新侵占,西方殖民者“若得此数千里之膏腴,必倡和党伙,窃窥边场,迫切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康熙皇帝支持施琅的意见,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因此,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在台湾设置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 3 个县。并在台湾设总兵 1 员,副将 2 员,驻兵 8000,分为水陆 8 营;于澎湖设副将 1 员,驻兵 2000,分为 2 营。至此,台湾作为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到了近代,在我国西北边疆出现危机的同时,以美、日为代表的外国侵略者又在我国东南海疆和西南边陲制造了严重危机。

美国早就企图侵占我国台湾。咸丰三年(1853 年),美国海军统领皮雷曾率舰队窜到台湾,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海军根据地。咸丰六年(1856 年),美驻华专使巴驾向美国